

【译文选载】

“亚裔美国人”的构建： 对第二代华裔及朝鲜美国人中的通婚和种族认同的思考¹

那兹里·克伯瑞尔
晏琼英 译

摘要：以 60 个深入的访谈为素材，本文研究了第二代中产阶级华裔与朝鲜裔美国人中的泛亚美国人认同的发展。我通过分析他们对跨民族和种族通婚的态度和信念，探讨了关于种族性的若干概念。这个分析揭示了正在发挥作用的泛亚美国人种族生成的过程，该过程以亚裔美国人文化及认同的建构为中心。亚裔美国人的建构是这样一个过程，它涉及对第一代亚洲移民的共同的个人经历和身份的认识，包括被主流社会标之以亚洲人的种族身份，及在一个亚洲人家庭中长大，坚守的包括重视家庭、教育、奋斗、尊重长辈等亚洲价值观。

关键词：第二代 种族生成 通婚 亚裔美国人 华裔美国人 朝鲜裔美国人

亚裔美国人身份这个术语一方面包含了战略性政治，另一方面是对表达多样性民族文化的误区（Limiting trap）（Takag, 1994: 239）。

乍看上去，由于亚裔美国人的多样性，他们不具有共同背景的前提，然而，在我那些有不同的亚洲祖先现在又相互交往的朋友中，渐次形成了一种有限意义上的共同背景与文化。对一些人，它产生于移民的经历，对其它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它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的美国经历——在白人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中的我们的种族特征，我们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的生活，以及主流社会对待我们的方式（Hing, 1993: P175）。

第二代移民的经历在美国传统上被理解为由同化的力量驱使的，这种力量使移民融入主流，也就是白人中产阶级那部份社会。然而，最近的学术研究描绘了一幅关于同化的动力及后果以及第二代经历的更为复杂和纷繁的图画（Portes and Zhou 1993; Fernandez-Kelly and Schaufli, 1994）移民同化的途径多种多样，而且也有可能形成一些完全不同于“主流”美国社会的团体，对美国的亚洲人来说，同化的一条可能道路是汇入一个泛亚美国人的团体。

在这篇文章中，我探讨了那些构成泛亚美国人认同进展基础的动力和过程。我尤其关注在跨民族²和种族通婚的态度和信念中已有所揭示的第二代³中产阶级华裔和朝鲜裔美国人中的“亚裔美国人特性”（Asian American-ness）的经验和意义。美国的“亚洲经验”的分析家们已经看到主要是在种族和政治意义上的“亚裔美国人”的构建（Lowe, 1991; Espiritu, 1992; Espiritu and Ong, 1994）这就是说在美国社会中，亚洲第一代移民由于共同的种族身份而形成了旨在保护和促进他们利益的战略政治联盟。我的发现表明在第二代亚裔美国人中，一种泛亚美国人意识正在发展，这种意识超越了战略性的政治意义。第二代华裔及朝鲜裔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亚裔美国人”是因

¹ 本文选自《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ume 20.Number 3 （July 1997）。

² 我定义的种族群体是首先基于生理特征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定义，而民族群体是以文化和国籍为基础划分的，这些特征并不是互不包容的，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边界重叠是重要的复杂的。

³ 我将“第二代”界定为移民的子女，即在美国出生以及从 12 岁更早就在美国有一代。



为他们意识到在美国的亚洲人，尤其是作为亚洲移民的孩子，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经验和世界观。

“边界”、“外婚”、“亚洲美国人的民族生成”

“边界”这个概念经常作为一种把群体差异和认同的机制概念化的方法用在种族研究中（Barth, 1969; Wallman, 1986; Magel, 1994）。我认为对族群成员来说，外婚经常会造成“边界困境”或带来一种设身其中考虑关于某人种族身份问题的观念空间。也就是说，当他们考虑外婚对民族亲和的意义和影响时，群体成员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关于标示他们身份的边界的界定、含义和意义。因此，对外婚的思考是理解民族认同的概念和经验的一个有用的工具。特别是对那些有审查与“外来人”婚配的牢固传统，同时又有较高比率外婚的族群。通过对异族通婚的可能性及严重性的强调，激发族群成员对外婚的有意识的思考。

围绕外婚产生的各种问题，最基本的一个是如何界定它。这一问题貌似简单，其实它被民族边界的复杂性弄混了。尤其是那些随形势而变的、多层次和突出的特点（Nagely, 1994）。举例来说，在界定外婚时，民族亲和的重要性随情境的不同而改变，这是下面因素的反应：从婚姻配偶的社会阶级背景到本地可能做为结婚对象的其它民族。对外婚的二分式定义也忽视了民族身份多面性的特征。事实上，不应在绝对意义上看待外婚，而应将其灵活地视作一个以婚配伴侣所认为的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共享种族身份为基础的连续体。因此，在对美国通婚问题的研究中，Spickard（1989）注意到族群对待通婚的一种“优先等级”的现象。例如，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移民以一种递进的方式来评价婚姻对象，不仅考虑是否是中国血统，也考虑在语言和地区方面的接近。亲和度越高的婚姻对象越合适，因为这代表了更大程度上的共同成员身份。

因为民族的边界不是僵硬的、固定的、而是变动的、突现的，所以群体构建外婚连续体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动。对移民群体及其后代，我们可以预期外婚的界定会受到他们集体身份变化的影响。这种变化发生在他们定居以及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集体身份的转换，即通常所说的种族生成，很久以来被看作是移民经历的关键特征，作为融入“主人”社会更高过程的一部份，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在一些新意识到的亲密性（如民族、宗教）基础上渐渐并入美国已有的、涵盖范围广泛的团体中（Glazer and Moynihan, 1963; Greeley, 1974）。以前从地方性（如村庄、省）来认识自己的移民开始从国家民族（如意大利人、中国人）意义上来看待自己。或者，正如欧洲民族的经验所表明的，共同的宗教身份如“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教徒”渐渐比国家民族的身份更重要（Herberg, 1995）。当发生了这些身份变化时，外婚的连续体就要重新界定。

近年来，人们对移民的种族生成的兴趣不断增长，这种兴趣受到了美国一些新出现的社会情况的促进，包括 1965 年移民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非欧洲的移民人口的增长。同样与此有关的是高涨起来的种族意识（特别是在少数群体中）以及把种族建置为获取政府资源的基础和 60 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支持种族性的少数群体的政治动员的基础。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就不奇怪大多数关于种族性的民族生成的学术论著着重于它在政治组织领域内的发展而不是它在个人如何理解群体方面的影响（Padilla, 1985; Cornell, 1990; Espiritu, 1992; Gopez and Espiritu, 1990），举个例子，看看泛种族性的政治群体和组织的发展，比如“土生美国人”和“拉丁人”，它将以前相互区别的民族集团沿着包容性的、经常是基于种族的界线聚合起来。通过这样的分析，泛民族的形式是被战略性的利益以一些重要的方式推动的，这些利益与通过形成一体化组织来在政治领域



更有效地提出要求相联系。泛种族化的战略特点通过高度的随机性和波动性而得以凸现。也就是从所处的环境出发，或者对国家民族身份的强调胜过对泛民族身份的强调，或者与之相反。

在政治组织和联盟的层次上关注种族生成的倾向尤为突出地体现在关于亚裔美国人的泛种族性论著中。事实上，有些观察家争论道：“亚裔美国人”的构建本身是一个特别突出的政治和战略的构建。它是受政治目标而非文化同一性的意识所推动的（Takgi, 1994: 239）。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就辈份、阶级和民族而言，极具多样性的这一事实使我们很难去讨论一个共同的亚裔美国人的经验。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泛亚美国人这一意识，它也是为大量亚裔美国人群体和组织所培育的（比如、亚裔美国人资源作坊，争取公平再分配亚太美国人联盟，亚太裔妇女网络）。而这些群体和组织是民权运动的结果。这些亚裔美国人论坛为发展跨越亚洲国家界限的网络和关系以及构建和传播亚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社会情境。譬如，在大学校园里，亚裔美国人学生组织为亚裔学生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反映作为亚裔美国人的共同经历的场所。亚裔美国人研究课程中的活动也为这批学生提供了理解和表达作为亚裔美国人的共性的共同的框架（Weiss, 1974; Espiritu, 1992; Espiritu and Ong, 1994）。这些框架取决于如下理解：种族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中心的、不可逃避的动力，而亚裔人在美国社会中拥有着某种共同种族地位和种族历史。如 Espiritu 和 Ong（1994: 302）所述：“泛亚洲人”组织通过从种族角度界定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从而增强种族团结。简而言之，这些组织表明最终将亚裔美国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以种族为中心的政治议程。

由于这些分析极度侧重于亚裔美国人论坛的作用，它们并没回答关于亚裔美国人认同的发展的许多问题。对亚裔美国人群体和组织的参加和接近对亚裔个人来说绝非是一种普遍的经验。它们的成员多出生于美国，并且是中产阶级的那批人，尤其是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士（Espiritu 和 Ong, 1994）。而且，甚至在既是中产阶级又是第二代亚裔的人中，我们也能预料到，在参与和接近亚裔美国人组织的程度上，存在着种族差异。尽管存在着差异性，“泛亚洲人性质”意识的可能发展并未穷尽，这种意识独立于或在动机和特征方面可能不同于这些论坛促成的意识。

亚裔美国人认同的发展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不依赖于靠拢亚裔美国人群体或组织。我们可预测：主流社会指定的种族归属成为亚裔美国人认同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动力。基于一个人的身份特征将其自然标识为“东方人”或“亚洲人”而无视其国家民族特征这是大多亚裔群体的一个普遍体验（Gowe, 1991; Espiritu, 1992）¹。分析家假定外部标识逐渐地进入个人的自我观念，也就是，发现自己被标注为亚洲人的亚裔人，将开始从这些意义上看待自己。纵使他们在过去从未这样。但是，对美国的当代黑人移民研究却使我们注意到种族认同过程中高度竞争和变动的特征，以及探讨种族“指派”与团体成员理解并回应这种指派的途径之间的互动的重要性（Wold Midael, 1989; Waters, 1991, 1994）。虽然海地和印第安美国人发现他们自身被广泛地标注为“黑人”，他们对自身的概念以及对美国黑人的集体关系的概念，以复杂的方式成为同一构建的动力。这有时会导致他们拒绝融入美国黑人社区。亚裔个人是如何理解和回应亚裔种族指派，以及将他们的自我观念带入认同形成的过程，我们对此知之甚少。

通过对在美国的亚裔人如何理解种族标识的微观探究，可以很好地透视亚裔美国人集体性中成员身份的性质和含义。就种族认同而言，美国黑人和亚洲移民之间的一个决定性差别是：在前

¹ 这也许是一个误导，认为东方或亚洲种族是指所有亚洲原生群体，或认为所有亚洲原生群体都属同一层级。举例来说，菲律宾美国人有时是西班牙化的，而亚洲印度人及其它南亚人也从不被看作是种族意义的亚洲人。



一种情况下，种族标识所指的是对群体历史具有相对强烈、清晰的意识的美国黑人这个群体的成员身份。反之，亚裔人面对的是一个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意识尚未发展起来的群体的成员身份。“亚裔美国人”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由 60 年代的一些活动家首创从而发展起来的。研究亚洲美国人的项目及一些团体一直积极地对其学生和成员灌输并教导一种共同的亚裔美国人历史。但是显而易见，关于亚裔美国人之间的纽带的实际存在，仍然存在着重要疑问。

在这篇文章中我通过对第二代华裔和朝鲜裔美国人通婚的思考，探讨亚裔美国人认同发展的过程。尽管华裔和朝鲜裔美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相区别，但这两个群体都被贴上了“亚洲人”的种族标签¹。特别是异族通婚通常不被中国人和朝鲜人赞成时，而华裔和朝鲜裔通婚的比率尤其第二代的比例却是很高的²。这些条件使得对通婚的考察成为分析家研究民族性一个极具有用的工具。利用 1980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Lee 和 Yamanaka（1990）统计在美国出生或是第二代的华裔美国妇女异族通婚的比例是 36.8%，而第二代朝鲜裔美国妇女的比例为 66.9%³。他们发现大部份外婚，特别是妇女的外婚对象是白人，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亚裔之间的通婚，例如：美国出生的华裔美国人男性的外婚对象中有 35.1%是“其它亚裔”血统。

研究方法

这里提供的材料是来自和洛杉矶、华盛顿地区的第二代华裔和朝鲜裔的 60 例深入交谈，这个研究只限于年龄在二十一岁到四十岁之间的第二代华裔和朝鲜裔。交谈对象被问及他们的种族和民族身份关联在以下生活领域如工作、家庭、邻里关系的作用和影响，为时在一个半小时到四小时之间的交谈做了录音，随后被整理成文。这些被采访人选自各种教堂、职业或社区俱乐部、专业学校和大学校友联谊会提供的名单。

尽管成长于经济背景差异很大的各种家庭，但被采访人都受过大学教育，许多还有研究生或技术专业学历。事实上，大部份（大约 3/4）被采访人要么结婚对象是专业技术人员，要么本身就是做技术工作的。虽然这些特征通常与卷入亚裔美国人机构相联系，但仍有 2/3 的被采访人表示很少或没有参与亚裔美国人群体或组织。

说到婚姻状况，60 个受访者中 28 人已婚，在这 28 人中，15 与同民族的人结婚，余下的人当中，10 人与白人结婚，2 人与其它亚裔结婚，1 个与非洲裔美国人结婚。与已婚者相对照，较高比例的单身受访者涉足跨种族和民族的交往关系。32 个单身的第二代华裔和朝鲜裔中的 14 人告诉我们已有一种会谈婚论嫁的被他们描述为“严肃”和“负责”的关系。这组人中 7 个是与其它亚裔、3 个与白人、1 个和拉丁人、还有 3 个是和同族人建立了这种关系。

外婚的边界困境

¹ 对朝鲜裔和华裔美国人团体进行全面和广泛的比较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一些相关的区别包括华裔居民更长的历史，从十九世纪早期就开始的记录，与朝鲜裔 1965 年后大规模移民形成绝对优势的人口相对照。同时，华裔和朝鲜裔移民同为 1960 年后美国移民潮的重要部份。与华裔朝鲜人形成对照，朝鲜裔美国人在他们早期移民群体社会背景方面是具有同质性，因此，他们的社团结构更紧密。

² 亚裔群体之间的通婚率比土生美国和太平洋岛屿之间的低，但高于白人和非裔美国人（Jacobs and Labov, 1995），Lee and Yamanaka 统计的是：在亚裔群体中，通婚率最高的是日本人，其次是韩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中国人和印度人。而 Jacobs and Labov 的分析显示，所报道的朝鲜人和越南人的通婚率有某种程度的误导和夸张，因为他们将“战争新娘”或与美国老兵结婚的外国妇女包括在内了。

³ 美国生华裔和朝鲜裔男性通婚率的可比数据分别为 37.6%和 69.4%（Lee and Yamanaka 1990）。



就外婚的观点、偏好和行为方式而言，第二代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然而在他们如何体验以及理解外婚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共同的主题和思路。其中有对浪漫爱情的信念，最终选择伴侣是基于爱情的考虑，而不是是否属于同一群体。浪漫爱情的观念和个体的选择、自由结合在一起形成第二代对外婚“边界困境”思考的恒常背景，甚至在那些对伴侣选择的种族或民族界线有强烈限定意识的人中也是如此。然而这些信念和认为伴侣的选择应该与群体的认同相应的认识共存。对伴侣选择颇具重要性的边界之一就是亚裔美国人这一边界。下面我探讨了受访人中“泛亚特质”意识的发展，这由他们对外婚的“边界困境”的思考揭示出来。

种族标示和亚洲种族

与其它亚裔属同一种族的意识被认为是泛亚美国人意识发展的关键之所在。在我的受访人中，某种“亚洲”种族成员的意识经常与从第一代移民继承的种族观念并存。种族，尤其是从拥有共同世系或源自共同祖先（而不是具有共同表型的一类 phenotype）的意义来说，是中国和韩国关于民族的当代观念的一个重要部份。共同祖先的纽带为发展和保持特定的认同和传统提供了背景。反映在对这些移民的观念的影响方面，许多第二代移民在交谈过程中脱口而出他们属于朝鲜族还是华族。

如 Frankenburg (1993: 99) 观察到的，当两个群体之间的边界被理解为生物学实质的，那么与群体外的婚姻会带来破坏或玷污血统纯洁的危险（混血种族的孩子被看成是这样的代表）。对第二代来说，这些危险深深地与他们关于家庭荣誉的意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外婚带来的跨种族会因为混入非朝鲜或非中国血统而威胁到家庭世系的纯洁。这种血统纯洁的破坏威胁到家族荣誉也许还会威胁到家族世系的延续。因为“混血儿”不被视为家庭姓氏的承担者，毫不奇怪为什么似乎男性要比女性受访人更关注血统纯洁的问题，然而，在妇女中也存在这些意识。举个例子。Sandra，一个二十九岁出生于美国的朝鲜裔妇女。她的父亲对她强调了种族延续和家族延续的关系。他强调她和朝鲜人结婚对家族的延续是多么重要。由 Sandra 转述她父亲的想法，因为在父系朝鲜家族系统中，女儿不能继承父姓而是通过婚姻进入丈夫所属的家族中。这一事实显得极有意思。

“我和某个朝鲜人结婚对他们特别重要。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是犹太美国人。他们喜欢他，但他不是朝鲜人的事实是个大问题，我父亲和我谈到这一点，虽然太夸张了，他还是说，如果你和一个非朝鲜裔人结婚会结束我们家族的历史。在家里，我们有三本家谱可以追溯到在中国的四世纪，尽管我不是男性，我也不会继承家族的姓氏，女性也仍然属于家庭的历史。”

对第二代来说，关于家族血统纯洁的考虑是伴随着作为它基础的种族认同的观念以复杂的方式和美国社会的更大背景互相作用。在美国，关于保持种族纯洁的明确关注被普遍视为“种族主义”，因为它们和无视肤色的社会流行理念相抵触。由于对种族主义的理解，一些受访人抵制传统的血源观念，在访谈中常常提到浪漫爱情观和个人选择的思想。但是另外一些人，象 Jeff，是一个二十三岁的朝鲜裔美国人，却非常干脆地接受了这种传统观念。他谈到种族划分成为限制了非白人一体化可能性的美国社会的基础，作为对此的反应，朝鲜裔是如何努力通过内婚来维护边界。他的言谈显示出在理解种族与民族认同关系方面一种微妙的转变：在婚姻中保持种族边界的需要已经从害怕被坏血源纯洁的驱力转变为对种族主义的防范。在这种转变中，民族认同也被重新诠



释，从植根于同一血缘关系的共同体转变为对被美国社会排斥的反应。

“听了我父母的观念并认真思考之后，我非常愿意作出决定：娶一个朝鲜人。我希望保持世系（停顿）……，我不想说保持世系纯洁，因为那有一种消极的内涵，但是我不希望混血，我知道这听上去象种族偏见，但是很大程度上它是因为一个事实，这个社会在某种深层次上根本不接受我们的事实。我认为和一个朝鲜人结婚很重要，因为不管你如何认为你是一个美国人，但实际上，你的黑头发、黄皮肤和你的朝鲜血统，你是不一样的，另外，混血孩子要面临很多问题。”

这是一个必然推论：是美国社会的歧视导致了对本民族认同的忠诚，强化了亚裔种族认同的意识。因为第二代在主流社会经历的种族排斥和歧视是将他们作为亚裔遭受到的而不是作为个体的朝鲜人或中国人，当然与其有关的是在美国以华裔或朝鲜裔来作为种族识别的动力已自觉地将其归入“东方”或“亚洲”范畴而不是将其以国家民族来识别。在种族上被标识为“亚洲人”的经验对朝鲜裔或华裔忠于自我认同赋予意义并给予鼓励，然而它同时也帮助产生一种亲近“其它亚裔”的意识。

随外在界定称呼和认同形式之间的复杂关系被凸现，我的受访人在如何理解和解释亚洲种族团结方面有一些重大的不同。个体之间理解上的差异的重要缘由之一是靠拢亚裔美国人组织的程度不同，那些有参予亚裔美国人组织经历的人更倾向于给亚裔美国人共同的种族基础附加上明确的政治要素。也就是说对于这些人，重要的是亚裔被作为一个种族意义上的群体结成政治上的联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尤其是那些 70 年代成人的亚裔，结成政治上的联合的需要扩展到生活的多个方面，包括约会和婚姻。一般而言，在作为婚姻配偶方面，亚裔美国人要比特定的亚洲某国人，当然还有白人更具优势。Sam，一个朝鲜裔美国律师，他在 70 年代中期加利福尼亚校园的亚裔美国人政治活动中相当活跃。他谈到“与亚裔结婚”对他要比“与朝鲜裔结婚”更重要。在大学他的亚裔美国人政治激进分子伙伴中，与一个非亚裔人的婚姻决不只是单纯的个人选择问题，而是一种对政治信仰的背叛。这种信仰是要反抗美国对亚裔和其它少数民族的种族压迫。

“我不再考虑要娶一个朝鲜女子，但我只会和另一个亚裔结婚，我不是想和一个朝鲜裔结婚，我是想和一个亚裔结婚。大学里，我的亚洲人身份而不是我的亚裔美国人身份变得对我很重要。同时在我那时的社交圈里，同一个非亚裔人结婚、特别是和一个白人结婚极不明智。那时的口号是‘亚洲人一体’、‘黄种人权力’之类，现在这对我仍然很重要。当我想到我的孩子，我总是从亚裔美国人而不是朝鲜裔美国人的角度来设想他们的婚姻。”

在那些没有特别靠拢亚裔美国人论坛的第二代中也存在一种归属“亚洲种族”的意识。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种族意识和象 Sam 这样的受访人表达的特征相异。对他们来说，亚裔共同的种族经验——被标识为“亚洲人”并受到排斥——并不指示共同的政治事业或步骤。它们没有被整合进一个前摄的政治立场。相反地，这些经验只是单单指示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的大背景下，从种族意义而言，亚洲人内部共享的东西要比他们与其它美国社会的群体共享的东西要多。

虽然有这些不同，正如在第一代移民中也存在的，在第二代中仍然存在与其它亚裔种族具共性的强烈意识。象被他们的子女所转述的，许多移民父母在他们的孩子不能同一个朝鲜人或中国



人结婚的情况下更愿意他们的孩子同“亚洲人”结婚（cf. Pang, 1994: 114）。一般而言，对移民父母来说，在外婚（对象）的连续体中亚洲人的倾向性被列在第二位，这一连续体的一端是来自特定国家民族的群体，另一端是黑人。对“亚洲人”的偏好，部份源于共同种族的意识，这种意识对移民代来说不但是由美国社会中他们所得到的种族标识生成的，而且由美国社会相对于他们的母国而更具种族和民族的多样性（这只会促使与别的亚洲人的共性而不是差异性的强调）这一事实所生成的。

Wayne，一个三十岁的华裔美国作家和艺术家，他在纽约长大，他说到他的母亲最初因为他约会一个非中国女孩是如何沮丧。而当她知道是一个朝鲜裔美国女孩时，这种沮丧立即烟消云散。起码，她儿子的朝鲜裔女朋友使她安心的部份原因是：以她的观点，朝鲜人和中国人具有生理上的相似性。很明显，和她的理解有关的观念是，美国人不能区分朝鲜人和中国人。

“不久以前，我母亲谈到我已经大了应该结婚了，我说：‘我想我会和一个不是中国人的女孩结婚。’她真的很沮丧。我有些惊讶，因此我们好久没有再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当我十分认真地告诉她我和一个朝鲜裔女孩相恋时，她确实很高兴。她说：‘噢，朝鲜人，朝鲜人，他们像我们，他们很像我们，有时候你分不出来，美国人分不出中国人和朝鲜人有什么不同。’”

对第二代来说，同一种族的意识不只是源自起码在主流社会眼中的亚洲人生理特征的相似性，它也反映了对于共同种族历史的认识，或者一种来自被主流社会从种族意义指派为“亚洲人”的一整套共同经历。一些人（特别是那些靠近亚洲美国论坛的人）提到在美国亚洲人共同的种族压迫的历史（例如，反亚洲移民法，仇视亚洲人的犯罪），更多的受访人则是寻求亚裔美国人共有的个性的种族史——这通常是围绕着共同的“成长经历”的。举例来说，在孩子时，他们就被取笑、嘲弄，象一个受访人描述的亚裔种族普遍被称为“中国佬”、“日本佬”、“外国佬”、“叫花子”、“斜眼人”，他们也描述了第二代亚裔美国人如何共有类似的约会经历，特别在他们的青年时期。

确实，我所有的受访人都谈到对他们以及其它亚裔美国人来说美国大众文化对亚洲人特性的成见和臆断是如何影响到他们的约会经历。男性会遭遇到一种关于亚洲男性缺少性魅力、性冷淡和女人气的想象，而女性会遇到“放荡、淫乱的亚洲女性”的成见（See cheung 1990）。一些受访人提到在成长期，许多亚裔美国人经历了一个“白人化时期”（white phase）或者一个希望变成白人的时期——这是对体验到的排斥和否定性成见的反应。Meg，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华裔美国女性，在拉斯维加斯长大。现在在洛杉矶一个娱乐中心做主管，她比较深入地谈到这个问题。在接受采访时她正和一个日裔美国人相恋，尽管几年前她只和白人男子约会：

在上高中时，我经历了一个“白人化时期”，我记得我对朋友说我只和白人男孩约会。我不约会亚裔男孩（我：为什么你认为你经历了一个白人化时期）我想被白人接受意味着很多。我认为所有的亚洲女性都经历过这个时期，起码我的许多朋友是这样，在亚裔美国人中关于忠于什么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混乱。

但是我发现我的受访人中关于同一亚洲种族的意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也不总是包括所有的原亚洲族群。与亚裔美国人组织共同宣称的最具包容性的理念相对应，第二代趋向于视一些亚洲群体比另一些与自己更亲近，这不是泛指“其它亚洲人”而是与他们有一种特殊亲和力的东



亚人。由于存在中国人朝鲜人历史上的对日本人的敌意，所以第二代人所谈及的与日裔美国人的亲和性尤其引人注目。事实上，一些受访人谈到他们的父母如何发现接受一个日裔美国人是很困难的。这是由于在本世纪前半期日本对中国和朝鲜侵略暴行的记忆在他们心中仍然鲜活。但是如第二代所说，甚至在他们的父母中日本人和其它东亚人一般被视为在外婚的连续体中更为接近，这是和其它亚裔如菲律宾人、越南人、柬埔寨人相比较而言。Greg，一个三十二岁的华裔美国工程师，他生在波士顿、长在波士顿，谈到他母亲愿意让他和一个东亚女性结婚：

“她开出一个单子以便我知道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是中国人，那么是日本人或朝鲜人，白人当然在其次。我记得菲律宾人和越南人不那么被接受。（我：为什么是这样？）我猜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和我们不一样，与日本人、朝鲜人相比更是如此，并且他们总被看成不那么成功。我知道越南人是新移民，我想这也有关。”

如上文所显示的，亚洲群体如菲律宾人、越南人和柬埔寨人与东亚人相比排名靠后，在种族和社会经济生活方面他们与东亚人之间有着更大差异性。同样的发现在 Ginpang（1994：115）关于朝鲜裔移民父母对子女婚姻配偶的民族倾向性分析中提到，Pang（1994）提到菲律宾裔美国人被朝鲜父母视为从种族到文化都迥异于朝鲜人，这部份是由于西班牙在菲律宾殖民的经历。越南人由于越南作为一个国家在美国以及全球意义上相对较低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被区别于东亚群体。

“移民故事”和亚裔美国人的历史和文化

第二代理解的“亚裔美国人”的边界不仅是种族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亚裔美国移民的文化同一性被置于“移民故事”框架中来理解。如 Bacon（1997）所说，在美国的第二代经历被普遍认为是经典的原型的“移民故事”，这些故事由系列二分式的对立概念所建构，移民对美洲本土人；传说对现代等等——这些有助于界定第二代移民经历。“移民故事”为以一种叠合和情境化的方式看待所有这些关系提供了一个手段。在移民故事中有两个特点与第二代建构泛亚裔历史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第一个是第二代的边缘的以及“两不相关”的位置，这是由界定移民经历的二元对立的双向拉动导致的；这种不稳定性在 Tommy 的谈话中得到生动说明。Tommy 是一名二十五岁左右的朝鲜裔美国人，她八岁到了美国，在南加州一个富有的白人聚居区长大的。在说到她愿意选择一位朝鲜裔伴侣时，她也强调她所共有的第二代移民的体验和认同：

“我愿意与朝鲜人结婚，但不是来自朝鲜国家的人，而是美籍朝鲜裔人。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经历。（我：偏重什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朝鲜移民，所以他能够理解朝鲜裔家庭的功能。他也能理解所有的移民体验。在我小的时候，当朋友们到我家来时我就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与别人的不同。我们房间里的东西与别人不同。我们有不同的习惯，譬如你进屋之前要脱鞋，你们吃快餐，你们在冰箱里放的东西也不一样。我想我能和喜欢我们朝鲜人这些东西，并乐于作为移民的人更好地相处。”

在由移民故事建构并强化的各种认同中，有一种是关于亚裔美国人的，尤其是东亚美国人的



认同。对我的受访人来说，特别是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格格不入”是他们如何认识自身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认同危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不但要面对作为美国生活一部分的种种成长的烦恼，同时还要面对由自己的民族和移民身份带来的烦恼。这些“认同危机”有多层面的特征，这是由它们来自一种多层面的无归属感造成的。举例来说，我的大部分受访者都有一种坚定的想法，就是他们不会与刚从中国和朝鲜来的移民结婚，这是因为他们成长于美国，感到在某种程度上与移民的或本土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团体、文化（如语言、风俗等）已经疏离了。

第二代移民认为他们的亚洲教育背景是导致他们与非亚裔，尤其是他们的白人同辈们大不相同，甚至格格不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作为亚裔移民的子女，他们以某些特殊的方式成长起来。我经常从受访者得知，亚裔的父母们比非亚裔的，尤其是白人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要高得多。例如：在学校里获得高分，几乎是亚裔父母对子女的一个必然期望。如果在学校里得不到好成绩，将会引起被几个受访者描述的“亚洲父母负罪感。”在这里，家庭的荣誉和神圣是实行规训的武器。还有一些期望是与亚裔对家庭的特殊强调有关。例如，要求承担照顾年幼弟妹的责任，以及照顾象祖父母这样的年老的亲属。一般而言，亚裔的父母为儿女所规定的行为准则更为严格，特别是对于女孩约会的规矩更为严格和僵硬。

如同我的受访者所描述的，所有这些具有亚洲成长背景的特征都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亚洲的”，而要被看作是“移民的”，“种族的”甚至更为特定的“朝鲜人的”或“中国人的”，例如，对子女学习成绩的重视在移民中是一个普遍的倾向。然而，这些以及他们的教育的其它特点似乎是与第二代移民的特定的“亚裔美国人”的观念有密切关系的。Jenny，一位从事文秘工作的三十出头的华裔美国人，向我们描绘了中国父母特殊的教育子女的方式。但是，她在讲述过程中轻易且不自觉地讲到这种方式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亚洲的。

“中国的父母比美国父母更为严格。他们要求子女努力学习。在进入大学前不要约会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对我的朋友们来说不是这样的。（我：你是说你的非华裔的朋友？）是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所有的朋友都是白人。但是我的确知道许多其它的孩子有同样的经历：严厉的父母和规则，这是亚裔特有的。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能欣赏这一点，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痛恨过这些规则。”

所谓的“亚洲价值观”造成了这种共同的子女教育方式。事实上，共同的亚洲价值观处于第二代移民所理解的亚裔美洲人的文化中心的位置。这些价值观被描述为对家庭、教育、诚实努力工作以及尊敬老人等方面的强调。Gorden，一名未婚的三十多岁的华裔住院医师告诉我，尽管他同各种背景不同的女性约会，但他还是愿意与华裔女性结婚。其次的选择是与一名亚裔女性结婚，因为中国与亚洲的价值观有相似性。那种在选择伴侣中浪漫爱情与个人选择的观念，和那种以为具有相似价值观的伴侣才会导致一种使个性得到表达和支持的关系的看法，这两者不是能轻易协调的。

“我与各种各样的女性约会：黑人、白人、中东人、拉丁美洲人。我喜欢这样，但是在面对婚姻问题时情况就不同了。当你结婚后，你想以你父母教给你的方式生活。对中国人来说，这



意味着教育，努力工作以及诚实。（我：所以你宁愿与一位华裔女性结婚？）是的，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没有跟一位华裔女性约会过：当然我可以娶一位华裔女性，也可以娶一位亚裔女性，因为她们会与我共同的生活信念。”

一般而言，亚洲人认同核心的文化价值，但第二代移民也会在这些价值观上形成亚洲群体内的差异，东亚人（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与这些价值观联系最紧密。SOO Jin，一名二十五左右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朝鲜裔人，女性，正与她的华裔的未婚夫一起生活。她感到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具有共同核心的价值观。但是，不能肯定在其它亚洲人那里这些价值观有多强的体现。

“谈到我与 Jim（她的未婚夫）的关系，我想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中国人与朝鲜人有着共同的工作伦理和家庭观念。我想那是非常亚洲式的东西。（我：你认为所有的亚洲人都共有它们吗？）我认为日本人是，越南人与菲律宾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但不完全。这与儒学有关，那些更儒学化的国家更强调这些东西。”

象 SOO Jin 一样，有一批受访者把关于家庭、教育、努力工作以及尊敬老人这些价值观看作是一种与东亚国家，特别是受到儒学影响的国家之间历史纽带的遗产。这种东亚人对共同儒学传统的认识，因这些国家有相似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得以强化。如我所描绘的，那种认为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比其它亚洲人更具有种族相似性的看法，是由他们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它地方一般来说良好的，可比较的社会、经济形象所支持的。同样地，那种有共同的儒学传统的看法也由于对东亚的成功故事的看法和想象得以加强。也就是说，东亚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成功为他们在儒学价值观的联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如上述情况所表明的，在用这些核心的价值观来建构东方文化时，第二代移民认为东亚人不仅是具有这些价值观的人，也是因为这些价值观而成功的人。这些核心价值因肯定它们与我前面所描绘的关于奋斗和适应的移民传说的联系而被唤起。第二代移民所理解的“亚裔美国人”经验，是必然地与移民故事的这个方面联系的。换言之，亚裔美洲人是由于他们在美国共同的社会、经济成就而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成就正是由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以重要方式所预示的。对亚裔美洲人成就经验的理解反映并再次肯定了这种在美国通行的形象：作为楷模的少数或者是一个由于坚持工作、教育和家庭观念的美德而干得出色的群体，亚裔美洲人作为楷模的少数“模范少数民族”的形象的看法已经受到了一些亚裔学者和活动家的批判。例如，Hurh 和 Kim（1989）批评说这种看法不仅简单化，甚至歪曲了亚裔美国人的生存条件，而且还会引起亚裔与其它地位低下的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和仇恨。虽然有这些有害的后果，我的结论认为关于作为楷模的少数“模范少数民族”的形象是亚裔理解他们自己的民族性，尤其是他们的“亚洲特质”的关键的一部分。

在更大的意义上，核心价值观被第二代移民用来确定他们在美国的“民族”成员身份，或者是用以确定他们是与移民故事密切相关的人们。不认同这些核心的价值观的纯种白人也是距离这种在美国的移民体验最遥远的。所有那些既是“民族的”又具有更多独特性的民族身份的人，相比其它人，被认为与核心价值更接近。尤其是“家庭价值观”，它使亚裔与主流白人社会或非亚裔的民族联系淡漠。Katie，一名 35 岁左右的华裔牙医，在旧金山出生并长大，在谈到她为了寻找一位与她同样重视家庭的伴侣而远离了所有非我族类的白人。



“我最后的两个男朋友从文化上说是西班牙裔，因为对西班牙人来说家庭观念很重，而我正是看重这一点。我发现高加索人和白盎格鲁人不太有家庭观念。所以我与更有家庭观念的人约会，如中国人，日本人，西班牙人，亚美尼亚人，南斯拉夫人。我所遇到的高加索男人都不错，但是他们太以自我为中心并且疏远家人。如果我问他们：‘你母亲怎么样？’他们说：‘我不知道。’我又问：‘她和你住得近吗？’他说：‘是。’我接着问：‘你不能去看看她吗？’他说：‘不。’我感到很惊讶，我不习惯这样。对我来说这是不值得认可的。”

这些选择有共同家庭观念的人作伴侣的理由之一是如下确定的需要，一个人通过对伴侣的选择，确定一种有别于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感。对许多人来说，美国主流社会正由于核心价值观的丧失而处于社会和道德滑坡的境地。Goerge，一名三十五岁左右的朝鲜裔医生，他与一名朝鲜裔女性结婚，对这一点有强烈感受。他认为核心价值可以用来标识中国人或和朝鲜人，同时它们也可以在更一般情况下可以用来界定民族身份，以使亚裔避免陷入缺乏个性、道德沦丧的美国“主流社会”的危险。

“我是朝鲜人，娶了一个朝鲜女人，并且在一个具有朝鲜文化观念的家中培育我的儿子。对我来说，唯一至关重要的东西是家庭和家庭价值，我认为在一般的美国社会，家庭观念基本上不存在，而这正是象犯罪，吸毒这一类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你所认为的家庭观念是什么？）我所谈的是离婚率以及父母不陪伴孩子这样的事实，还有教育、尊敬老人的价值观。”

结论

从第二代中产阶级华裔和朝鲜裔美国人对通婚的态度及观念的分析中可以显示出种族生成的过程。然而，由于这个分析是基于被选择出的随意的少数案例。所以有必要认识到这儿所提到的报告只是供参考和初步的。对亚裔美国人种族生成过程的更充分的了解需要在广泛而丰富的亚裔美国人案例素材基础上进行研究。

在我的受访人中展示的种族生成的过程是由种族标识这一关键方式促成的。但是，种族指派对认同形式的影响由于个体对种族标识经验理解的多样性而下降了。举例来说，对于那些有过参与亚裔美国人组织的经历的人来说，种族标识的经验会通过种族中心和政治性的透镜（由这样的论坛提供给他）加以理解，然而，更普遍的，第二代华裔和朝鲜裔是把亚洲种族标识经验理解为亚裔美国人共有的个人种族史的一部分。这一特定的理解不应该被看作十分依赖与泛亚美国人组织的接近。

概括一下，我发现，在第二代华裔和朝鲜裔美国人中，关于共享亚洲美国人文化的普遍意识是一种包含，但是超越了亚洲种族共性的意识。在描述亚裔共同文化的实质时，第二代肯定了美国社会视亚洲人为“模范少数民族”的既定看法。他们感到亚裔美国人共享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是亚洲教育背景和亚洲关于教育、家庭、勤奋、尊敬长辈的价值观的社会化。这种关于共同的亚洲文化背景的意识作为白人主流社会文化的对立物被清晰的构建出来。换言之，第二代致力于通过反对被看作同质性的白人主流文化来构建“亚洲特质”的边界。



我的受访者所表达的“亚洲特质”意识处于东亚裔美国人关系的中心位置。虽然第二代的华裔或朝鲜裔经常以“亚洲的”来指代他们的体验和认同的许多方面时，在访谈中他们实际上更多地仅仅是以“亚洲的”来指代那些来自亚洲的群体，而不是别的。这尤其是指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他们属于同一种族和文化。由于亚洲内部差异的意识部分地源自对社会—经济地位的看法，所以对非东亚群体社会—经济地位流行看法的改变或许可以消弱这些内部区分。

虽然我的研究表明，泛亚种族生成的力量在亚裔美国人口中的某一部分起着作用，但这也带来了亚裔美国人认同的重要性和长期可行性的问题。对我的大部分受访者来说，他们作为华裔或朝鲜裔的民族身分要比作为亚裔美国人身分重要得多。他们与中国或朝鲜的关系负载了在一共同体中的成员身分，这一共同体有对历史文化的深厚意识以及持续存在的社会纽带与网络。比较而言，“亚裔美国人”成员身份负载的有形意义较少。那么最终，在美国泛亚民族性的未来严重依赖于源自亚洲的个人的国家民族主义民族认同的命运。

然而，如果国家民族认同在同化的力量下的确消退了，我们就能预想亚裔美国人认同重要性的增强。Lopez 和 Ispiritu(1990)曾说“泛民族性”可能或把同化或把单纯民族主义树为种族民族少数群体转变的方向（P98）。有些人也指出：泛亚民族生成而不是同化于主流社会，可能成为融合的主导方式，这些人强调经典意义上的同化对于非白人群体比如亚洲人来说是一种不可获得的选择。最终，泛亚民族生成作为一种同化类型其力量和可行性将严重依赖于亚裔美国人出于自愿或出于必要，彼此投合的程度。如果亚裔美国人的社会联系（如婚姻传统和社会网络模式）是以亚洲划界的，“亚裔美国人”将会是有持久重要性的身份。

（参考书目略）

多元文化主义能解决问题吗？

米切尔·韦凡尔卡 (Michel Wieviorka)

杨晋涛 译

摘要：多元文化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这是指在社会学、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之间多多少少有些令人混淆不清的交叉点上，提出的三个问题：我们社会中的文化差异的来源及其意义何在？在某些国家中，各种机构和决策者以何种方式处理多元文化主义？为什么我们会反对或者拥护多元文化主义？本文将依次处理这些问题并寻求答案。文化差异不仅仅被再生产，它还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这意味着分化和再创的可能性是永恒存在的。在此情形下，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

